

苏东海：新中国博物馆研究的拓荒者



在北京老前门火车站的东面，有一栋孤独的塔楼。今年92岁的博物馆学泰斗苏东海先生就住在这里。这栋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高楼，在当年属于前三门地区的标志物之一。苏先生一家搬进来时，中国正迎来博物馆大发展时期，博物馆学研究也刚刚起步。苏先生对中国博物馆研究的拓荒之旅便从这里开始，又走向世界。他“借”来域外之火，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为中国博物馆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当年的明星楼已沧桑，苏先生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把喧嚣关在了门外。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面对前来探访的中国文物报记者，苏先生的眼里闪起了光彩。他

说：

祝贺你们，祝贺全国的文博工作者，我们已经走进了文化中枢的新世界。

苏东海先生祖籍徐州，1927年出生在北京。在那个“无处安放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他辗转南京、徐州和北平多地才读完小学。

从初中到高中，他又先后在北平、重庆、贵阳和昆明等地就读。回到北平上大学时，他有幸听到了胡适先生的课。现在提及此事，他会不由得感慨：

听过胡适先生课的人，

现在在世的还有几个人啊。

新中国成立前苏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坚信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2月，苏先生带着十几个大中学生参加了华北野战军，后来又踏上抗美援朝战场，历时4年5个月，经受了残酷的血与火的考验，为祖国立了功。10年军旅生涯，他多次徘徊于生死之间，不止一次目睹战友在身边倒下，磨练出了超人的坚强意志。

1959年2月，苏先生服从组织安排，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报到。

“我们要在国庆十周年前把陈

列搞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苏先生说，那时大家的工作热情都

非常高涨，但博物馆陈列该怎么搞却不知道。他所在的陈列部只有两

个人之前接触过博物馆和展览。

大家伙就按照苏联陈列模式，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拟定了主题，构建了陈列大纲。

陈列制作开始后，苏先生负责的木工组任务很重，大至陈列屏风，小到说明牌，都是木工活。

白天黑夜跟木头打交道，后来他风趣地对人说，自己研究博物馆就是从木材开始的。

1959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

馆在天安门广场落成，苏先生和同事

撞，这些外来的文化也影响了他对国内博物馆建设的思考。“只有理解自己才能吸收外来的有益的东西，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他认为，从文化角度看，博物馆最终应该达到收藏珍品、科学的研究和社会教育三种职能复合的形态。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博物馆经历了大发展到理论繁荣的阶段，为了提高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学术水平以适应博物馆建设的需要，苏先生又主持创办了《中国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通讯》两本会刊，让更多博物馆研究工作有了交流和推进的平台。

在不断的国际交流中，苏东海先生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博物馆概念——生态博物馆。访问挪威时，他发现一座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个农村社区文化中心，档案室存放着社区的档案和私人寄放的纪念品。这个社区就是一个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是“活”的，它保存着一种鲜活的文化。这让他感到震撼，于是他决定在国内做生态博物馆实践。这时的苏先生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经过反复考察，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选址在了贵州梭嘎苗族山寨。苏先生回忆说，梭嘎苗寨在深山老林之中，与外界隔离。他们至今仍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在这里建立生态博物馆，对传统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典型意义。从1997年动工到1998年10月建成开馆，在苏先生的多方奔走之下，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诞生了。博物馆主体建筑与村寨浑然一体，村民可以在这里活动，展示各种文化产品，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参观。

苏先生认为，在国内建设生态博物馆，要把国际化的种子，种在中国的土壤里。既要符合生态博物馆的国际化标准，也要有本土特色。生态博物馆要保护环境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要保持村寨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要树立村民的主人意识，提高村寨文化水平。

在苏先生的推动和指导下，贵州又成功续建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隆里生态博物馆等，内蒙古、广西和云南也相继创建了各自的生态博物馆，并逐渐建设成为生态博物馆群，为保护各地区的特色文化和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东海先生自称是过惯了简朴生活的，走进他的寓所，除了老旧的桌椅外，见不到一件名贵的物品，完全不像一位文博界大家的家。

2014年5月的时候，他就和老伴王迪一起，把他们一生收藏的108件（套）记录历史风云的老物件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这些文

物，记录了他们精彩的人生，也见证了历史的风雨。

王迪老师是苏东海先生的革命伴侣，两人一起参军，一起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她的弟弟也是志愿军战士，牺牲在了朝鲜，年仅20岁。转业到地方后，王迪进入北京日报社工作，是《北京晚报》创刊元老之一。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创刊号上头版头条“赵堂子居民开怀大鸣放”就是王迪老师采写的。

王迪老师一直帮助苏先生写作，苏先生每天写2000字，王迪老师就帮他打字录入2000字。2014年在首都博物馆的捐赠现场，苏东海先生和王迪老师最后一次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可惜，2016年3月10日早上，王迪老师在苏东海先生身边溘然长逝。

回想起老伴儿，苏先生的眼里又闪起了光。“我们没有办过像样的婚礼，也走过了钻石婚。结婚几十年没有自己的房子，前三门这套房是我们第一套房，当初搬进来的時候，我们俩一起布置这个家，像布置新房一样，可开心了。”回忆到这里，苏先生忍不住抬起了头，墙上挂着王迪老师的照片。

2016年9月，《苏东海思想白传》出版，书中记录了苏东海先生作为一名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拓荒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严肃执着研究博物馆各种问题的历

史脚步和思想轨迹，也有他和老伴儿生活中的甜蜜点滴。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最后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文博界我的同辈人和后来人，献给刚去世的我的妻子，以告慰她在天之灵。”

苏东海先生是我们《中国文物报》的老作者、老读者、老先生、老朋友了。《中国文物报》创刊34年来，苏先生为我们写来数不清的好文章，其中很多是饱含他思想智慧的精品力作，在文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苏先生也非常关注我们《中国文物报》的内容和质量，他一般出报当天就能在家看到报纸，每期报纸他都看得很细很认真，如果收不到报纸，他往往当天就会打电话来问能不能补给他一张，很多时候，他还会针对报纸刊发文章的内容优劣，打电话给报社有关领导说说他的看法和意见。

谈到后来，苏先生的状态越来越好。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文物报》“工艺专刊”和“文旅专刊”的创刊，说他读了柳士发社长写的创刊致辞，感觉非常好，祝贺报社拓展了新的领域。

今年是《中国文物报》迁京30周年。苏先生祝愿《中国文物报》越办越好。

临别时，他紧紧握住他的“小朋友”李让副总编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无锡 苏茂伦推荐）

▲ 6月6日《解放日报》刊发陈省之的文章《亦师亦友话苏欧》。苏东坡比欧阳修小整整三十岁，在北宋那个时代，这差不多要差两个辈分。但是，这两个辈分的差距，依然不妨碍他们成为亦师亦友的“师友”。该文列举了苏轼与欧阳修的五次交集，感叹欧、苏之情，可与口月共存辉。

▲ 陶文鹏教授的朋友复旦大学教授唐宋文学专家朱刚今年6月出版《苏轼苏辙研究》一书，6月7日作家文摘报在十二版文史版上，摘发该书一个章节《苏轼如何化敌为友》，第一小节是苏轼和王安石，第二是苏轼和沈括，第三是苏轼和刘安世。此书网上可购，特予推荐三苏群里。

▲ 6月12日《人民日报·大地》刊发苏少华的摄影作品《新安奇雾》。

▲ 6月13日《新民晚报·新民环球/论坛》刊发上海浦东领航文化工程研究院研究员苏世伟，受该版编辑之邀就如理清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构作为专家做详细解析，总标题是《细观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局”与“势”》。全文以问答的方式表述，分为四个部分：1. 美国的霸权行径与中国的举国一致；2. 经济的互补合作与争端的结构性悖论；3. 认知的国别差异与臆想的木桶效应；4. 贸易摩擦的僵局就是美国的败局。

中华苏氏寻根研究的阶段与特点（之三）

（上接106期）

所以三苏墓，郏县是“两真一假”；眉山则是“一真两假”。这里应该是苏氏“眉山派”追念祖先最应祭扫的地方。开封为北宋都城，不但留下了三苏的痕迹，芦山派的代表人物苏颂生前在此为相，并进行了世界级的发明创造。这里应该是苏氏“芦山派”最应该去造访的地方。固始，在家谱中有“光州固始”之称。在唐末五代从这里走出了苏奕、苏益，成为开闽的苏姓始祖。这里是闽台苏姓，最应该去追思的地方。

洛阳，长期为都。当年苏秦在这里起步，终于挂六国相印，成为苏家最早的彪炳史册的人物。苏谱上明确记载，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迁关东家族到关中，苏秦家族被迫迁至关中，后以武功为籍。

“武功苏氏”的代表性家族苏建、苏武，他们实为洛阳人。“武功苏氏”根在洛阳。所有天下的“武功苏氏”，都应该到这里去寻根拜祖。温县，苏国之都。西周初年，苏忿生以司寇之职，受封于河内地区。苏国十二城邑，分布今济源、焦作二市，及新乡市的西部，

成为当时畿内地区最大的封国。以公元前1046年到前650年苏国被狄人所灭，苏国存在长达400年。苏国是苏氏的第一次辉煌，苏忿生是苏姓第一人，没有苏国，没有苏忿生，就没有天下苏姓之人，就不可能有后来苏家的辉煌[14]。

近年来，河南的苏氏宗亲深感责任重大，使命神圣。他们积极联谊，并注册成立了“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苏姓委员会”。

2016年9月，正式整修了苏秦墓园并举办了苏秦纪念大典，让全国各地的苏氏宗亲认知河南。从20世纪90年代，洛阳市苏秦研究会成立，会长蔡运章对苏秦历史进行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秘书长何汉儒多方联系，奔走呼吁。苏克俊承载了四方组织联谊的重任，苏四喜则出资出力，为苏秦文化弘扬作出了贡献。苏福功，为大陆唯一的首届“世苏”总会的参与者，是河南苏家的领军人物。温县为苏国都城所在地，文献记载明确，考古遗迹丰富。我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到温地考察，并于1988年正式发表了《温史述论》的论文[15]。（待续）

青海苏氏宗亲成功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



图为秦腔折子戏《苏武牧羊》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华诞。青海苏氏宗亲于2017年7月20日上午十时许，在彩虹故乡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镇新添堡村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来自本省的门源县、湟中县、大通县以及来自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苏氏宗亲代表和数百名父老乡亲参加了庆典活动。庆典活动得到村两委班子的大力支持，村委主任即席讲话，充分赞扬了青海苏氏弘扬正气，唱响新时期主旋律，彰显苏氏好家风的高尚精神。新添堡村的苏氏青年学子自编自演了诗歌朗诵、歌曲、吉他弹奏等文艺节目，海东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交响乐团团长苏

年的丰功伟绩。秦剧团的演员义演的《苏武牧羊》折子戏，传颂了苏氏先祖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苏氏子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期，发扬苏氏的优良传统，敦亲睦族，友善邻里，造福桑梓，奉献社会。文艺演出结束后，与

会宗亲参观了苏氏先祖明朝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新添堡村建设新成就，庆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青海 苏恩）

化提供基础。同时，要将学术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开设《上海城市与红色文化》课程，突破相对封闭于课堂的传统形式，与红色革命纪念馆等进行联动，让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城市红色文化之美。

“上海是国内红色遗址遗迹数量最多的地区，具有完整性的特点，从新文化运动发轫、中共建党，到国共合作，从抗日救亡到迎接解放，红色文化伴随着上海这座城市成长的各个阶段。”苏智良建议，将这1000多处红色文化纪念地和遗址“连点成片”，形成上海独特的红色历史风貌区片，同时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强红色纪念地跨省联动，让这道“红色风景线”进一步延伸出去，让红色文化基因更好激发开拓前进的力量。（原载6月28日《联合时报》）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苏寿梁 苏永祁 苏空卿
终 身 荣誉 主 编：苏兴良
名 誉 主 编：苏 焱

副 主 编：
苏智良 苏岚烟 苏 旭
编 委：

苏德洋 苏颂兴 苏 晓
苏瑞常 苏慧娥 苏春生
苏盛余 苏建勇 苏妙兴
苏仕礼 苏傑珠 苏绍煥
苏峰光 苏 源

编辑部地址：
200434 上海市车站北路 612 号中星理想大厦 11 楼 苏寿梁（收）

邮 箱：
syqsyq58893@aliyun.com
448327552@qq.com

颍州，曾经留下无数的风流雅韵。它有着悠远的历史，商贾云集，一时的繁华，欧阳修本是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但晚年却迷恋颍州。竟然令身为宰辅的欧阳修最后竟将全家迁来养老定居，足见颍州对他的吸引力之大，颍州至今存着众多的古迹和无数的诗篇。有一个人虽然只在这里做了八个月的太守，却在颍水之上留下了一股清风，光辉千秋。他，就是苏轼。

元祐六年八月，秋风乍起，被贬官外放的苏东坡来到了颍州。满眼青山绿水，这是他曾经来过的地方。恩师欧阳修曾经在此做官，后来养老。想起当年和子由与恩师一起燕游颍州西湖的日子，多么开心啊！如今恩师已经仙去，自己又苦于朝廷的狭逼，就地重游，心灰意冷。但是如果真的醉情山水，做一个闲官，那就不是苏东坡了。

我们这颍州看到的不是吟山歌水的苏东坡，却是心系河患的太守。他到颍州刚刚一个月，便写下了《申省论八丈沟厉害状二首》，上奏朝廷。从文章可以看出，他绝不是那种混事的官员。即使贬官外放，也还是认真干好本职工作，一丝的消极。从这篇奏章里，我们看到的绝不是印象中的风流太守，而是一位风尘仆仆勤于职守的州官。从他对李义修观点的驳斥看，他对颍州水灾的成因进行了实地调查。一个月里去了万寿、汝阴和颍上三个县，这种办事效率应该令当今许多官员汗颜。苏轼在奏章中批评了一些官员的草草了事想当然的做法“罗适、崔公度当初相度八丈沟

颍水清风照千秋

苏歲烟

时，只是经马行过，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推翻了这些人草率决定“起夫一十八万人，用钱米三十七万贯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见得利害可否，及如何计料得夫功钱粮数目，显是全然疏谬。”奏章中多处用了“贴黄”，也就是说为了核对自己的观点，肯定又去做十分慎重的核实。“贴黄”是在奏章上进行补充说明，足见其审慎。“（贴黄：罗适计料八丈沟要开深一丈，而汝阳县官吏，只计料八尺。适亦不知，据数申上，其疏谬例皆如此。）”仅此一例，足证东坡先生勘察入微。遇到这样的上司，敷衍了事的官员能不现形，能不赧颜？

苏轼焚膏继晷，调阅了所有的历史案卷，发现两派不同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没有实际测量水平高差。尖锐地指出“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见地形的实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口争胜负，久而不决。”并且立即开展测量。“臣已选差教练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口至淮上，计会本州逐县官吏，子细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见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后地面高下、沟身深浅、

今天我们重温这件事，难道只

淮之涨水高低、沟之下口有无壅遏可得而见也。”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实干精神！为了取得科学的数据，九百多年前的一位贬职官员从中央政府来到饱受水患的地方，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为了了解淮水涨溢，走访淮、颍间农民父老，勘察每年颍河涨溢水痕，工作之细可见一斑。雷厉风行的作风哪里看得出是一位刚刚遭到贬职的官员！

关于八丈沟的议论全然凭数据说话，既否定了“起夫一十八万人，用钱米三十七万贯石”的拍脑袋工程，又严厉地批判了一批渎职浑噩的官员。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清正廉明，勤勉于政的形象，在北宋时期的颍水的一缕清风。深刻指出“议者欲兴大役，劳力费国，公私汹汹，未见其可。而义修先欲置津渡，立课额，以网小利，所见猥下，无足观采。其余议论虽多，并只是罗提刑、李密学意度，更加枝蔓粉饰，附会其说而已，别无可考论。”一针见血戳穿了地方腐败官员的谬论。有关颍州八丈沟的议论发生在九百多年前的颍水之上，仔细调查研究，提出观点，破析利弊，凭数据说话。就是放到现在，也是一项折服人心的提案。

当时的中央政府采用了提案，苏东坡八个月后便被调离颍州前往扬州任职，他没有看到他的方案实施的结果。北宋王朝可悲的是没有重用苏轼这样的人才，而是将他贬了又贬。对苏轼个人来说是个悲剧，对赵宋王朝来说何尝不是一个悲剧！

是为苏东坡的悲剧下场唏嘘？但是颍水之畔发生的八丈沟之议，不值得我们今人深思吗？

颍州西湖波光粼粼，文峰塔影静静，夕照之下的湖水让人遐思。来到颍州的人们徜徉其青山绿水的美景之中时，是否还记得九百年前有一位太守勤勉的身影？

我期待有一天能去颍州看看，

看看山，看看水，看看长虹卧波“朱栏明绿水，古柳斜阳”的宜远桥，看看荷蕖满湖摇曳生姿，看看东坡先生奏留了万名黄河夫疏浚的颍州西湖和三座水闸，用清淤泥土堆成遍植垂柳的苏堤。沿堤吟诵一下东坡先生的“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的诗句。我愿感受那颍水湖上的那缕清风，它似乎有些古老，却又是那么清新。

苏耿仁倡议：征集并汇编出版《苏氏烈士谱》

本报讯 广州苏耿仁宗长热心苏氏公益，乐于为族人尽义务作义工。自2014年10月创办《天下苏氏信息平台》5年来，他以敦亲睦族、弘扬祖德、崇尚先贤、宣传俊彦为己任，起早贪黑，天天搜集、汇编、发送世界各地苏家人的信息不计其数，无偿地传递族人的联谊活动，历史故事，先进事迹……，宣扬祖宗德，播洒正能量。他创办的《天下苏氏信息平台》，经历了从初涉、摸索、发展至成熟老到的过程，捕捉信息更及时，编辑技术更熟练，画面花式更多样，信息质量更提高，被点赞与转发的次数越来越多，影响力、知名度日益增长。他的这种热情源于家教家风。其父苏楚耀（1939—2001）就是岭南早期热心研究族史编纂家谱的著名人物之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胜利74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耿仁萌生了进一步办好《天下苏氏信息平台》的新构想，于7月7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之际，发出征集并汇编出版《苏氏烈士谱》的倡议：

在革命年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中以及当下新时代，苏氏家族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烈士。正是他们的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用生命谱写了英雄史诗，他们不仅是苏氏家族的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

苏氏先烈们的英雄事迹是激励我们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英勇壮举、卓著功绩和伟大精神必将永载史册，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奋勇前进，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多的业绩。天下苏氏信息平台将征集整理和收录那些在革命年代为革命、人民和祖国献身的苏姓先烈，统一整理在《苏氏烈士谱》专栏中及时发布，并尽最大可能汇编出版专册，让他们的义举永远在我们家族的心中永驻，百世流芳！以后各地宗亲需要编写族谱也可据此入编族谱，以供族人们铭记、缅怀！

倡议和欢迎各地宗亲个人或宗亲组织团体积极踊跃提供所知的苏氏家族烈士信息，可以直与天下苏氏信息平台编辑联系：

微信号：QsgrQ138033389

邮箱：138033389@qq.com

信息报送格式如下：籍贯、政治面貌、出生日期、生前部队、生前职位及典故、牺牲时间、牺牲地点、安葬地点、信息提供人。

于泉州提督官署，享年61岁。诰授荣禄大夫。晋赠都督同知，加一级纪录二次。封三代，荫一子。赐葬于晋江四十一都山院乡，今泉州市清源山支脉朋山岭南麓。

元配朱氏、继配孙氏，皆赠正一品夫人。传有二子七女。长子苏光弼，次子苏光曜。苏光弼字君佐，荫袭浙江宁波同知，后任杭州知府、台州知府，得仕十余载，历官三地，每到一处都是兢兢业业做事，御任归乡两袖清风，象他的父亲那样正直做人。

苏明良事迹，详见清陈大珍撰《苏明良墓志铭》、蓝鼎元《东征集》卷四、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三、光绪《漳州府志》卷二三、同治《福建通志》卷一二零、卷一四五、乾隆《福州府志》卷三五、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八、乾隆《陆丰县志》卷四、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十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二、同治《鄱县志》卷十二、光绪《台湾通志》列传、《大清康熙朝实录》卷二九三、《大清雍正朝实录》卷五二、卷一五九、《大清乾隆朝实录》卷十八、卷四九、卷五一、卷五四、卷五九、卷七四、卷八一、卷一七四、卷一七八、卷一七七、卷一八零、卷一八一、卷一八七。

1988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12、13、16、18、19、20、21、22、23、24、25、26、27、28册。

提督苏明良事略

福建 苏登科

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更难枚举，是以少年子弟易坠其术中。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则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但吃此烟，必列肴馔、果品，相兼而食，不致速害，及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即相率为盗，是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是鸦片之贻害地方，匪鲜浅矣！然地方官虽有禁止，不过代兵役开需索之端。以臣愚见，欲除此害，必绝其源。伏乞皇上敕部通行闽粤督抚：严禁洋商，嗣后如有与贩鸦片及私开鸦片馆者，或被拿获，或被首告，即将洋商、船户、铺家、地保、邻佑人等，概行从重治罪，并严加处分漫无觉察之地方官。庶民命拯，而盗源息矣。”（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847页）

因此，在第二年春天清廷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查禁贩卖“鸦片烟”的条例。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旨在禁毒的法规。也充分说明苏明良，是个正直、有胆识的人。正是这种高贵质量，才赢得了雍正帝的赏识。他是中国禁毒史上，第一个提出禁毒的人。他还三次获得雍正帝亲笔手书“福”字联。

现在，在岭头社祖厝正堂横梁悬挂的“福”字匾，就是雍正帝于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初二日钦赐苏明良。在“福”字匾左右，还有“奉旨葬亲”牌坊。这一“奉旨葬亲”讲的是，苏明良在雍正十年（1732年）向皇帝

请假三月回乡安葬父亲。也正是这次回乡葬亲没几天，雍正帝又旨令他立即接任台湾总兵官。

苏明良在台湾当总兵，只有两年半时间，却写了三十几篇奏折，史料相当丰富、翔实，小到一担米卖多少钱，都写得一清二楚。看他的奏折就知道，总兵不好当。不仅要带兵巡视海疆，维护社会治安，还要时时注意天气变化，收成如何。

在台湾史研究中，有关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先后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其缘由、背景虽然不同，但均属清季台湾“理番”事务中的重要事件。

在《奏报派员护送凤山等县各社番黎赴省庆贺圣寿折》里，苏明良就第一次提到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以及细致安排人员“沿途照料，护送赴省”。

清朝皇帝的万寿节庆，通常举国庆贺，邦国藩属亦派使朝贺献礼。而台湾原住民提出赴大陆贺寿则前所未闻。台湾原住民庆福一行，“赴省庆贺万寿”这一事件，无论源自原住民“向心归化”之愿望，还是地方官员弘扬皇恩之举，它开启了清代台湾原住民通过官方渠道赴大陆参访的先声，这不仅在清廷的台湾“理番”实践中属别出心裁之举，而且对乾隆时期原住民两次赴大陆贺寿朝觐也提供了前朝之鉴。

雍正有一个爱好：搜集把玩鼻烟壶。当时鼻烟壶在社会上流传极少，在宫中地位非同一般，只有极少大臣能得到专享。其

中，苏明良就曾得到雍正帝亲自赏赐的一只精美鼻烟壶，以及平安丸、御制扇坠、熏貂冠、貂皮褂、玻璃炉、火镰包等物。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经福建总督郝玉麟于台湾善后事宜等事案内，题请台湾镇照西陲边疆之例，改苏明良为（首任）台湾镇挂印总兵官，并获赏翎管壹个、花翎壹枝，犹荣之极。闰四月初六日，奉旨署理福建陆路提督印务。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突然病逝。从福州将军阿尔赛六月二十日写的奏折可以看出，当时苏明良正在台湾办理移交手续，准备去泉州接任陆路提督。

乾隆元年（1736年）元月，苏明良署理福建陆路提督印务兼署水师提督。乾隆二年十月，实授苏明良为福建陆路提督。十二月，苏明良奏报福宁府属霞浦县地方桐山一堡，为浙闽山海交错紧要之区，请改设县治。乾隆帝从之，并命县名“福鼎”。

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七年（1742年），苏明良任福建陆路提督八年。官居一品，显赫一时。但他还是朴素待人，洁己奉公。捐祖庙，助宗亲，赈贫民。在任期间，军队训练有素，严防守卫，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谕调苏明良为广东提督，未及就任，于十一月十六日子时，病逝

苏智良：上海何以成为中国革命“红色源头”

本报讯 7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苏智良的文章《上海何以成为中国革命“红色源头”》。文章认为，上海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现场，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不仅红色文化内涵丰富，而且“红色源头”特点明显。作者从培养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近代中国的光明摇篮、推进革命文学运动、促进人民运动高涨四个方面，提出了十四个鲜明的“红色源头”特点。

第一，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第二，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第三，上海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起航地。

第四，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第五，上海是运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城。

第六，上海是革命书籍报刊的中心出版地。

第七，上海是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驻地。

第八，上海是城市革命暴动的试验地。

第九，上海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策源地。

第十，上海是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

第十一，上海是隐蔽战线的主战场。

第十二，上海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

第十三，上海是新四军的后援地。

第十四，上海是反内战第二条战线的主阵地。

(苏智良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江南书院顾问)

苏长福，1924年3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5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新疆军区汽车三团、六团驾驶员；1954年12月任兵团机运处汽车二营三连驾驶班长，1960年10月任副指导员；1964年首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汽车营营长；1980年6月任农一师运输公司副经理；1984年10月任兵团工交局运输处调研员。1987年1月离休。1991年3月被授予工程师职称。

苏长福一身从事汽车驾驶和车辆管理工作。他热爱本职工作，认真贯彻车辆管理规定，严守交通规则和操作规程。在任何情况下都一丝不苟。他爱车如同爱生命，并根据新疆地理气候条件改进了许多保养方法，能更好的发挥车辆效能。经他摸索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车管工作的珍贵资料。从1951年~1959年八年间，他驾驶吉斯150型载重汽车，创造了原车发动机安全节约行驶50万公里无大修的全国最高记录，延长了近10个大修期，节约大修费用4.5万元。完成了168.9万吨公里，接近完成了12年的运输任务。节约油料5.8吨，节约轮胎22条，上交利润18万元。为表彰他的功绩，1958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他特级劳动模范称号，苏联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授予他荣誉证书并予以奖励，他驾驶的汽车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苏长福佩戴奖章照片

藏。1959年光荣地被选为新疆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赴京观礼代表，在北京国庆10周年的观礼席上，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出席“群英会”的代表苏长福亲切握手，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元帅亲切接见了苏长福，并合影留念。195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发出《关于在全军汽车部队开展学习苏长福运动的通知》，开展学苏长福、赶苏长福、超苏长福的群众运动。

1959年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1960年被兵团树为“十二面红旗”之一，2011年被评为“新中国屯垦戍边100位感动兵团人物”之一。

2005年2月28日，苏长福因病于乌鲁木齐逝世，享年81岁。

(河南 苏航供稿)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中的两位苏姓人士

6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上)》，共303名候选人，其中，助人为乐类60名，见义勇为类60名，诚实守信类56名，敬业奉献类65名，孝老爱亲类62名。在“全国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中有苏玉琴，女，回族，1957年4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吕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负责人。她身患癌症，经历大小手术20多次，仍坚守乐于助人的善心，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做公益，成立多个服务组织，带领1100多名志愿者常年开展公益活动，将爱心播撒到天山南北。

6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下)》，在《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中有苏云翠，女，汉族，1974年3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税务局科员。10多年来，苏云翠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依然承担起照顾丈夫兄妹4个孩子的重担，照料他们生活起居，供他们上学，诠释了无私的亲情大爱。她荣获云南省道德模范称号。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当选经社理事会主席 苏如春当选理事

7月31日，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领导班子、常务理事和理事。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张庆黎当选理事会主席。华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苏如春当选理事会理事。

张庆黎强调，新一届经社理事会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全国政协党组领导下，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行职责，按照国家对外工作总体

部署，做深做实对外交往工作，发挥新型高端智库作用，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努力推动经社理事会工作取得更大进步。“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苏如春表示，在新一届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领导班子带领下，华邦控股集团将秉承产业报国的初心，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加油助力，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华邦控股集团简介

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2000年，总部位于广州市琶洲

流淌的红色血脉——记三墩西源一门四烈士(之一)

三墩乡隶属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红色沃土，将军故里，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地处平江县中部地区，相传古有凤凰、孔雀、鹭鸶栖息于此，化形而成，是名三墩。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盛产铅、锌、长石等各种矿石；这里有勤劳俭朴的人民群众，油茶、楠竹等农产品行销省内外，“油海”之名饮誉四方；这里有优良的革命传统，走出了苏振华、李梓斌、谢忠良等一批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先辈德泽惠及华夏。

平江三墩的西北角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叫西源，西源有一处遐迩闻名的屋场，叫泰阶源。泰阶源屋第一代主人是苏秀俊，他是清太学生，终身职业是开馆教书。他一生注重品德修养，待人宽厚仁慈，深得众人爱戴。

秀俊对自己的后代要求十分严格，他勉励儿女应以耕种继承祖业，以读书振起家声。他为了使大家广博地学习，不惜代价购买各种书籍，人们称泰阶源为“书库”。秀俊要求每个孩子除学校授课和自学外，兄弟间应相互调教，取长补短。以后弟弟们学业有成和参加革命矢志不渝与兄长的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秀俊有九个儿女，有四个先后参加革命，他们前仆后继，为革命壮烈牺牲，其事迹可歌可泣。

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苏构堂

苏构堂，生于1897年5月。构堂自幼聪颖，好学习，爱劳动。他喜欢接触实际，对事物有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于1918年考入湖南第三联合中学(即现在的岳阳一中)，进校后，他便成为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曾多次受到学校的表彰奖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构堂和一部份同学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便挥戈上阵，积极参加、紧密配合这震撼中外的爱国青年运动，构堂会讲演、会写作，对旧世界口诛笔伐，在校内影响甚大。1921年，构堂于岳阳联合中学毕业，由郑鼎勋老师介绍到平江第三高小教课。当时三高的校长

是廖岳袁。他是共产党员，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廖校长觉察到构堂老师不愧是具有时代眼光的先觉者。第二学期，构堂就由廖岳袁与在平江开展革命活动的余贵民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构堂对时代思想方面的宣传极为努力，他订购了许多时代性很强的书籍，如《孙中山讲演》《建国大纲》《列宁纪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辛亥革命史》《东方杂志》《新青年向导》等，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写下了不少心得体会。构堂在平江三高任教了四年，这四年，是他上下求索的四年，是把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四年，是确定战斗目标而开始勇猛冲杀的四年。一次，构堂在家给弟弟们讲《精神与事业》的作文时说：“世界上的人没有不愿意事业成功的，可是真正能成功的却又很少很少，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由于没有奋斗的精神。孙中山先生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民国，他起初不是屡次失败么？但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所以成功了”。构堂给弟弟们讲课何止一次，而是十次百次，在课堂上、在作文批阅中、在家里，不断地灌输革命的思想，因为这位兄长的谆谆教导，才使得弟弟们一个又一个地投身革命，献身于党和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构堂于1926年放弃了教书这一职业，全身心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日夜奔波于市井乡村之间，宣传于工农群众之中，他深得党的信任，深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大批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那白色恐怖中，共产党没有被杀绝，而且斗争更英勇了。当时，湖南革命根据地以平、浏两县为首，成立武装组织为“湖南工农革命军浏平游击队司令部”，上级任命构堂为平江县委第十三区委，1928年任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同在一起的革命同志有陈孟耕、吴信初、徐子才、秦咸、童富厚、徐礼彪、李茂青、萧助国、钟漾波、罗纳川、余本健、陈佛章、胡筠、余江、邹芝漠、吴黑撑、余贵民、钟期光、周得益、周继善等。当时，构堂到处直接或间接发展革命组织，他在来往家乡间隙中介绍发展的党员有汤主、汤幼

主、徐雁凤、苏文瑞、李开怀等同志。那时，环境极为险恶，稍有不慎，就有牺牲的危险，但构堂不屈不挠，朝夕不离平江的革命工作。

1929年5月18日，反动白军及平江常备大队获悉构堂和其他同志在传梓源开展工作，出其不意地围攻。由于寡不敌众，又无救援武装，构堂被反动派的枪弹毙命，牺牲在传梓源王家源，时年三十三岁。



构堂一生思想纯洁，同情工农，赤胆忠心，献身于革命事业，可歌可泣。(待续)

▲ 5月30日《人民日报·文化》发表苏滨的“新语”《放开手脚，享受劳动快乐》，提出：家庭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只有从一根线、一粒米的小事做起，成长的基石才能一层层夯实，人生的扣子才能一粒粒扣紧。

▲ 6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会长王伯军的文章《我眼中的苏东坡从政生涯》，该文有5个部分：没有能比得上这篇奏议的了；徐州太守政绩证明其能力；最关心杭州居民用水问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灾民；拟了约八百道圣旨。

▲ 6月4日《联合时报》刊载的《赵朴初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活动举行》报道中，出席人员有华文出版社书画部副主编苏刚。

▲ 6月4日《解放日报·文史》刊发潘裕民写的《谁发出了唐代诗坛〈金石声〉》，介绍唐代诗人陈子昂。作者认为，初唐时，从李世民至唐高宗、中宗、睿宗、武后都喜欢“宫体诗”。一批又一批诗人竞相奉和，倾心倚靡，如虞世南……苏味道、李峤……等，都是著名的宫体诗人。他们的诗歌，辞藻华丽，内容空洞，多半是吹牛拍马的奉和应制之作。一时间，整个诗坛为“绮错婉媚”之态所笼罩。

……到陈子昂这里，他高举以复古为革新的大旗，旗帜鲜明地提出诗歌革新的主张，从而逐步将唐诗的发展引向了正确轨道。……在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上，李唐一代诗风之盛，子昂实有开疆拔缕之功。

▲ 6月4日《文汇报·笔会》，刊发美国斯坦福的李黎写的《没面子的何绍基》，讲她家传一幅书法大家何绍基(1799—1873)书苏东坡文赠与鲍源深的横幅真迹的故事。李女士本姓鲍，鲍源深(1811—1884)字华潭，号穆堂，是她的五代高祖。经查，这幅字的内容是引自苏轼写给表兄程正辅(程子才，南宋词人程垓的祖父)的书简“四十七首之三十四”。但是经懂行的老人发现，此书幅已被艺高胆大的装裱人将夹宣纸撕揭去上层，所以作者以“没面子的何绍基”作为文题。